



16~18 世纪欧洲政治近代化与高等教育发展考略

王飞麟

摘要:在 16~18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与政治近代化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政治与教育显示出相关性。本文将从高等教育发展对政治空间的需要及欧洲政治近代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奠定的制度基础这两个方面,来对这一时期的欧洲高等教育之政治前提作一番考量。由此可以发现,政治近代化的核心是世俗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世俗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渐显性化,欧洲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时机便愈益成熟。

关键词:欧洲;高等教育;政治近代化;世俗化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之密切,古今中外论述充盈。如成书于中国历史上战国末期的《礼记·学记》就载有这样的文字: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①。几乎与《礼记·学记》诞生同时期的荀况(公元前 313~公元前 238)也曾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②。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公元前 399)则将教育的目的归结为培养治国人才,直接为政治服务。他在同另一智者安提丰的对话中说:“是我独自一人参预政事,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出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事,使我能够对政治起更大的作用呢?”^③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把教育视作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教育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联若放在 16~18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与政治近代化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就更能显示出这种相关性。笔者将从高等教育发展对政治空间的需要及欧洲政治近代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奠定的制度基础这两个方面,来对 16~18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之政治前提作一番考量。

一、欧洲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宽缓而开放的政治秩序

16~18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宽缓而开放的政治秩序。“宽缓”较易理解,而“开放”当作何解释呢?这应从西方政治思想的整体发展来加以分析。多年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徐大同指出,西方政治思想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它能够在发展的差异性中保持其历史的继承性^④。西方政治思想体系所经历的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权利政治观的相继转承则表明了西方(19 世纪前主要指欧洲)政治结构在内部协调、外部影响的双重作用下,自我调适、渐形成

①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 1996 年,第 545 页。

②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511 页。

③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8 页。

④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第 7~8 页。

熟的开放性。16~18 世纪的欧洲高等教育正需要在这种开放的政治秩序下求得发展。

16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已趋鼎盛,宗教改革蔚然兴起,加之新航路开辟、商贸金融业扩大、城市经济兴起,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及在此经济条件下踟蹰前行的欧洲思想界均面临剧烈变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胚胎已在封建社会母体内逐渐成熟的必然结果。新兴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城镇新贵族与乡间士绅试图营建适应自身发展、反映本集团经济与文化需求的政治秩序。在当时条件下,经济实力不甚强大、政治经验尚嫌稚嫩的资产阶级还难以直接凭借暴力夺取政权,他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并在多数情形下与各封建王权联合起来,进而形成上升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和长期以来因备受割据领主与宗教势力双重挤压而尴尬不已的欧洲各世俗王权互为奥援,以对抗诸侯及宗教集团。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①恩格斯所指的市民即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中坚,而他指的‘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则隐含反宗教的世俗化潮流,因为欧洲政治自早期封建采邑制建立以来,宗教权威及在此之下的教仪、规制、守则、信条等一直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纽带,而到 16 世纪后,这条纽带不复当年的坚韧之状,面对民族国家渐趋形成的整体意识及杂然其间的新教化运动,宗教权威已远非 11~12 世纪时可比。11 世纪时,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 年在位)甚至能恣意凌辱世俗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为求得自己的世俗王位,并免受被开除教籍之罚,竟长途跋涉到卡诺沙,雪夜拜求格里高利七世^②。比格氏稍晚的乌尔班二世(Urban II)还能发动绵延近 200 年、由欧洲多个世俗封建领主襄助的十字军东侵。其它如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 年在位)、卜尼法秀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 年在位)都提出了系统的教权至上主张。卜尼法秀八世甚至在其‘两剑论’^③中指出,教皇是世俗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世俗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教会的授予与委托,所以他必须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④。16 世纪,欧洲各中央集权迅速扩大,各世俗封建主已非先前那般被动而局促地受制于教会。同时,经过宗教改革及其衍生的各国教派间绵久的战争、某些国家(如英国)的国教化运动,教会威权几乎扫荡殆尽。那些仍效忠罗马的教士们迫于生计,不得不理性地接受俗权倍增,而教权式微的事实,退而修正自身的对俗关系,缓和教俗矛盾,从而苟全教界残败衰微的地位。

由于宗教影响的弱化及 16 世纪人文主义的兴盛,使得 17 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理性主义成分剧增,这进一步加速了 16 世纪后欧洲政治空间非神学化的步伐。16 世纪前,文艺复兴逐渐浸润着几近干涸的文化河谷,诚如英国学者沃尔夫(A. Wolff)所言:“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⑤而随着 17 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人们对理性的颂扬与对蒙昧的鞭挞渐渐超越了文艺复兴所局限的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并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开始挣脱神哲体系下冗长繁琐的思想禁锢,用直觉、经验及在此基础之上升华出的理性判断,检视身边的现实问题。而 17 世纪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在 16 世纪世俗化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进行构筑的。在这一时期的欧洲知识界,涌现出了很多自然科学家,他们建立在细致的实验与缜密的推导基础上的定律及被政治学者们奉为不二法门的自然主义权利观,形成了自然与社会间至为微妙的洽合。

如果说 17 世纪对于欧洲政治是科学革命背景下,自然主义哲学观全面引领思想界的世纪,那么 18 世纪则是启蒙思想贯穿始终、政治近代化日趋成熟的世纪。启蒙思想对封建王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历史学者斯科特(H. M. Scott)曾指出,在 18 世纪的欧洲,为数众多的封建主们均受启蒙思想熏袭。在他们及其同样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智囊的带领下,许多欧洲国家秉承启蒙主义政治法则,改善自身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448 页。

②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44 页。

③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路加福音》,南京 1998 年,第 22 章之第 28 节。

④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 100 页。

⑤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第 6 页。

行政、司法及财政体系,激发国民对工商业的发展热情,大力改善农垦,并废除农奴制,加大对天主教会的国家控制,扶植高等教育,扩大中等教育^①。对启蒙运动,德国学者卡西勒(E. Cassirer)甚至给出了比斯科特更为广泛的论述。他指出,整个18世纪,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里,它们的日常事务及整体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思想的规范,这些影响或许会因各国的具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启蒙运动乃是一股大潮^②。启蒙运动使欧洲各专制王权向着公共权力下移的方向发展,而专制的政治结构则在公认的人类理性的操控下运转。这就宛如手操权柄而又冥顽不灵的君主及其专制机器被开启了一样。故而18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将这种体制称为‘enlignhtened despotism’^③。‘despotism’单独来解,是指不屈从于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威制^④,而‘enlightened’又是开明的意思,两者间能共存吗?卢梭对此就持疑问。1767年,他在与同另一启蒙思想家的通信中,称这个词组是自相矛盾的^⑤。卢梭的批评建立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未能厘清开明专制的历史因袭关系背景下。显然,开明专制绝非平地而生,它是历史地出现在18世纪时空之下的政治事物。而较为完满地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开明专制兴起后的一个世纪,即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W. G. F. Roscher, 1817~1894)。他于1847年前后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用‘Absolutismus’这个德文词汇来代替‘Despotism’^⑥,从字面上回避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罗雪尔指出,专制非独18世纪有之,它早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就有了,当各国以‘教随国定’原则治理臣民时,这就是一种专制,它是信仰专制,罗雪尔用了一个德语词组‘Konfessionaler Absolutismus’来表达;17世纪路易十四的法国是宫廷专制,罗雪尔称之为‘Höflicher Absolutismus’;而18世纪的欧洲则普遍地呈现出开明专制,罗雪尔就将其称为‘Aufgeklärte Absolutismus’。这样,罗雪尔就将欧洲专制制度300年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历史分析与定性解释。从中不难发现,16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迅速扩张背景下政治要求亦随之上扬的结果。专制的王权为了巩固自身政治地位,采取了部分地满足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做法,渐进地改革现存弊政,谋求与之妥协。而新兴资产阶级亦从自身处在王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微妙地位计,采取了对专制王权既争夺又合作,且战且欢的做法,意欲自上而下地实现政治结构的优化,以及公共权力的资产阶级化。这便是16~18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的关键。

16~18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有了这样一条发展脉络,即决定了它能以一种开放而宽缓的空间包蕴高等教育这一社会文化生活中系统而繁杂的事物。而摆脱中世纪宗教羁绊的欧洲高等教育置身于宽缓而开放的政治秩序内,将能更持久深入地沿着世俗化道路向近代演进。

二、欧洲政治近代化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

欧洲高等教育脱胎于中世纪的教会传统,其制度体系的发展在欧洲政治近代化的影响下,不断完善。兹从其制度体系的演变论述欧洲政治近代化的基础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曾有以下四个特点:(1)四学院制,即神学、文学、法学与医学(特殊情形下,法学院因民法与教会法分开而分成两个学院,所以形成五学院);(2)教师大学,以巴黎大学为典型的北方大学;(3)学生大学,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的南方大学;(4)教师—学生混合型大学,这些学校集中的领导,兼有教师大学与学生大学的性质特点,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及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是其代表。这些特点直到15世纪末,还较为清晰地体现在很多大学间。这一时期,在教师大学里,教师组成的团体主持教务;在学生大学里,学生团体主持教务,教师只在学科教学上参与管理;在教师—学生混合型大学里,前面两种大学的特点则兼有。16世纪宗教改革后,大学作为一种城市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王权对城市文化的控制加剧,大学受世俗政治权威的影响也显著加强了。同时,大学也加紧了对学生的控

① Scott, Hamish M.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18th Century Europe*. Hongkong: Macmillan, 1990, pp. 1~2.

② E. Cassirer. *Die 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Aufl. 2.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32, p. 3.

③ F. Bluche. “Sémantique du despotisme éclairé”, *Revue historique du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1978, (56).

④ R. Koebner. “Despot and Des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Journal of Warburg and Courtland Institutes*, 1951, (14).

⑤ C. E. Vaugha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Jean-Jaques Rousseau*,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5, pp. 159~162.

⑥ C. Rule. *Louis XIV and the Craft of Kingship*.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72.

制。比利时中世纪史学者里德—西蒙斯女士(H. D. Ridder-Symoens)指出,“当时的大学管理层尽可能地使学生组织边缘化,或使它们尽量保持沉默。”^①因而到了 17 世纪,先前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等欧洲南方地区的学生大学组织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与北方大学区别明显了。在这一时期新建的大学都按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大学模样去建制。以奥地利与西班牙为例,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甚大,地据奥地利和西班牙两个王国,而奥地利与西班牙又治理着除低地国家之外的南方地区,如意大利一些城邦,同时它又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恪守教师型模式,所以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欧洲南方大学在 16~18 世纪间,均按教师型去建制。再如意大利,其境内的帕维亚大学即在 1541 年与 1771 年先后两次被哈布斯堡家族给予了类似的‘北方化’组织条例^②。那不勒斯大学也是如此,1614~1617 年间,该校被西班牙籍的总督彻底按照北方模式改组了。此外,欧洲大学的特权也日渐具体。中世纪时,各大学便已经具有一定特权,这包括一定的司法权、自治权(起草法规、学术自由等)、豁免权(免除各种赋税及兵役等)、特别保护措施(对物价的限制、食品短缺时的优先供应等)^③。但应指出的是,当时的这些特权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直到 16 世纪后,欧洲大学的教师们才如同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特权,这包括参加议会、保留教产以及拥有在议会中相当数量的席位等。此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大学还陆续获得了林林总总的优越地位,如印刷业的垄断权、人口普查时政府给予的温和操作方式、可以身着有时只有贵族方可享有的服装等。当然,专制王权不会心甘情愿地使大学的特权无限制扩张,它们的主要意图还在于使欧洲高等教育按照自己的意志,向有利于巩固专制王权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一定阶段,王权仍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祭起操控法宝。如在法国,16 世纪后的大学虽被政府允许有自行保留起草与修订章程的权力,但这项权力需得在王室诏准,并提交议会表决后,方得行使^④。在德意志,甚至出台了更为细致的规章,使得政府能深入地干涉大学的教学规程、招生与毕业程序。如在英格尔斯塔特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就得到了当局的一纸禁令,它禁止学生到国外求学,并且强制性地规定学生只能在该校毕业,方能保证他们获得工作岗位^⑤。

专制王权对待高等教育的态度取决于自身的近代化程度。而教师大学在数量上压倒学生大学,以及大学相关特权的扩张与受限则都与专制王权的主观意愿有着莫大的联系。16~18 世纪,随着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的相继传播,专制王权也正在进行适应性调整,这对正在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具有着深远影响,它已不仅局限于大学的总体样式、相关特权的发展变化情况,还表现在大学与王权及教会的关系调整、财政收支状况这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与王权、教会的关系。

中世纪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高级主教秘书(senior episcopal authority, chancellor)的监督之下^⑥。中世纪时,这种秘书实则是某些大城市教堂的首席祭司,如巴黎、维也纳、科隆等城市;抑或是某些城市的副主教,如意大利波伦那市。到了 16 世纪,宗教改革席卷全欧,在一些新教国家里,原本由教会掌控的大学监督权则很快旁落至世俗封建领主手中。16 世纪后世俗化的趋势使某些天主教国家的教会也渐渐失去对高等教育的监督权。在这些国家里,天主教牧师竟要同市会议员、退休教授、贵族等世俗上层一起接受封建主的遴选,来执行对大学的监督权。试看在德意志境内的三所大学:阿特多夫(Altdorf)、图宾根(Tübingen)与马尔堡大学的监督权状况,我们便可知道 16 世纪后大学监督权的世俗化情形了。在阿特多夫大学,学监是由纽伦堡市议会的议员担任的;在图宾根大学与马尔堡大学,学监的职位竟是由这两所学校自己培养毕业的博士生去担任的;在众多欧洲国家大学学监为非教会人士担

① Walter, Rü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5.

② Università di Pavia. *Statuti e Ordinamenti della Università di Pavia dall'anno 1361 all'anno 1859*. Pavia: Università di Pavia Editrice, 1925, p. 155, 201.

③ P. Kibre. *Scholarly Privileg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2.

④ M. Montlaur. “Le pouvoir royal et les universités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1700~1762”, *Poissions de theses*, 1970, (1).

⑤ K. von Prantl. *Geschichte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in Ingolstadt, Landshut, München*, Aalen: Scientia Verlag, 1968, p. 383.

⑥ R. A. Mülle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Vo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sität zur deutschen Hochschulen*. München: Engel Verlag GmbH, 1990, pp. 23~24.

任的同时,不难发现,学监工作正随着世俗化的加快,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其任命已不能简单地视作是教俗两派争夺高等教育领导权的表现。如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其学监被称为‘maestrescuela’,‘maestrear’在西班牙语里是动词‘指挥’的意思。而‘escuela’则是名词‘学校’的意思,两词缀合表明了学监就是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的管理行为。与萨拉曼加大学类似,法国的大学学监的实际职能则非常充实,大到学校的规章制度的修订,小到典礼仪式的布置,可谓事事悉出其手。另外,不仅大学领导权世俗化了,而且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法国政府还将世俗化与国家政权的强化联系在一起。18世纪,法国大学开始变得国家化,大学竟宛如政府机构一样,各级官员、地方议员都从各个层面处理着大学事务^①。在奥地利,由于有了开明君主玛丽娅·特雷莎的领导,1760年该国政府建立了专门处理教育事宜的部门:学校委员会(Studienhofkommission),它有些类似现代各国的教育部。在特雷莎的筹划下,学校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处理着帝国境内凡与教育有关的问题^②。由于奥地利还控制着意大利部分地区,所以特雷莎的这种高等教育政策还覆盖到了意大利。如特雷莎1771年在北意的米兰设立了“学校委员会”^③,该委员会作为米兰公国的一个组成部门负责监督境内的帕维亚大学及所有公立学校,而该委员会除秘书与书记员外的另外5名成员,1名总监、4名委员均从帕维亚大学的神、文、法、医四个学院中选出^④。在西班牙,其国家政策参与高等教育领域时间较早。1623年,西班牙就建立了教育委员会(Junta de Educación)及学院委员会(Junta de Colegios),后者就是由6名曾从大学毕业的人士组成,他们被委以监督西班牙大学事务的职责^⑤。在波兰,情形也相似,1773年,波兰建立了由世俗政权掌管教育工作的政府部门——国民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由波兰克拉科夫(Cracow)大学校长兼任,他还同时负责监督大学里的师资培训工作^⑥。

以上只是简述了几个略具代表性的欧洲国家在16~18世纪间大学与王权以及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发现,16世纪后,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世俗化趋势明显。16世纪前,教会掌控的对高等教育的监督权逐步旁落至世俗显贵手中,各国政府(几乎都是专制王权)普遍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而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愈益显著地与国家政治的总体运行联系在一起。

第二,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问题乃是高等教育发展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一国高等教育要发展,或某国某校要维持运行,良好的财政状况是关键。大学作为经营性主体在16~18世纪是难以想象的。因而里德-西蒙斯说,不仅在中世纪,而且哪怕是在近代早期,财政资源的缺乏都是欧洲高等教育史上的常态性事物^⑦。不可否认,某些大学的财政状况相当充裕,但在16~18世纪的欧洲,仍有众多大学在温饱线上挣扎,教学与科研的组织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一些大学的运行靠私人或校友的慷慨捐赠维持,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根本性地解决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还是得依靠政府切实、有效、系统的财政支持。

中世纪晚期,大学所在地区的地方政权也对大学进行了稳定而持久的资助,其前提是政府应获得对大学更大的控制权。但是,大学对于政府资助的企望往往因种种原因而落空,这是由于中世纪诸侯间的私战频仍,每每战端一开,就军费靡巨,和平时期政府对各大学许下的财政承诺在战火纷飞间无法兑现。进入16世纪,随着宗教改革引发的各种冲突在欧洲各地展开,大学的经费问题依旧严峻。17世纪,欧洲战火更炽。大学只能靠集中校产、聚拢资金建立基金会等方式来保证大学的支出项目。而各开明君主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首先,他们支持大学理性预算,厉行节约。其次,开明君主们也通过各种形式对大学给予财政支持。如专制王权向大学直接投资,或者进行混合融资。直接投资的最佳例子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对乌普萨拉大学的财政支持。为使瑞典的高等教育直追欧陆其他国家,古

① M. Montlaur, “Le pouvoir royal et les universités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1700~1762”.

② J. Stanzel, *Die Schulaufsicht im Reform des Johann Ignaz von Felbiger (1724~1788)*, Paderborn: Schöningh, 1976, pp. 237~238.

③ 意大利语为 Magistrato Generale degli Studi.

④ Università di Pavia, *Statuti e Ordinamenti della Università di Pavia dall'anno 1361 all'anno 1859*, p. 201.

⑤ R. L. Kagan, *Student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Spain*,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74, pp. 146~147.

⑥ L. Hajdukiewicz, “Du Moyen Age aux Lumières”, *CRE-Information*, 1985, (69).

⑦ Walter, Rü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I, p. 183.

斯塔夫二世不吝巨资。1620 年,皇室还增加了教授职位的数额。原先没有财产的教授们有了稳定的收入。1624 年,古斯塔夫二世还将自己在阿普兰(Upperland)与瓦斯特曼兰(Västmanland)地区的私人庄园赠给了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永久的、不可剥夺的校产。这包括大量农庄与磨房,以及分布在哈尔辛兰(Hälsingland)与瓦斯特曼兰的八个教区的什一税所得。古斯塔夫二世的这项捐赠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都是令人瞩目的。这令乌普萨拉大学在此后的 200 多年中无比繁盛^①。以上了解了直接投资及其案例,那什么叫混合融资呢?就是政府将一些特定项目的税收收入,如法国的盐税、威尼斯的四轮马车税等,还有罚没的财物、关税收入等投给大学。再次,开明君主们还将特定的教产以馈赠的方式拨给大学作为教职工的薪水发放的保证。18 世纪末,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就是如此,它接受了不少于 300 宗来自政府方的馈赠^②。专制王权还通过没收教产、向教会开征税赋及免征大学税赋等手段联合使用的方式增加大学的财政收入,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这是一所信仰新教路德宗的大学,1536 年该校重建时^③,其收入来源是:从教会所有物中没收的财产、主教对两个教区抽征的什一税、对两个教区的教堂征的学习税、由丹麦王室给予每年 200 达勒尔^④的资助、每年由修道院承担的拨给家境寒微学子的 27 份奖学金等,同时哥大不仅免于赋税,而且还能向师生出售免税的啤酒与红酒来赢利^⑤。尤其是出售免税的啤酒与红酒一项在尼德兰地区也是非常盛行的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扶持方式。如鲁汶市政当局就与鲁汶大学签署了多项禁止关于酒类走私的协定。鲁汶大学利用自己可以销售免税酒的特权,竟将酒类免税专卖的权利转移给了部分市民,导致政府税收流失。从这个条件的侧面可以看到尼德兰地区地方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力度。1640 年,鲁汶市统计流失的酒税竟然达到数千盾^⑥,鲁汶大学就使用这项收入支付教师薪酬、校舍兴建与图书购置。在尼德兰的乌特勒支市,为避免鲁汶市的漏税情形发生,同时又要支持本地大学的发展,该市市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他于 1657 年废除了乌特勒支大学的免税权,但同时又给予该校每年 150 盾的津贴,作为生源不足时经费困窘的补偿^⑦。

三、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 16~18 世纪欧洲各国王权在强化过程中试图与上升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合作,因而其政治秩序即朝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在中世纪还显赫万分的教士阶层在这一轮的政治调整中成为了牺牲品。表现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教士的监督权被剥夺,世俗王权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加重,大学愈来愈为世俗的专制王权服务,同时开明专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包括在组织结构、财政支持等诸多方面。结合罗雪尔对专制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说,16~18 世纪既是专制体制由信仰专制发展到宫廷专制,再到开明专制的过程,也是欧洲政治逐步近代化的过程。近代化的核心是世俗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世俗化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日渐显性化,欧洲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时机便愈益成熟。

●作者简介:王飞麟,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机关团委书记,《长江论坛》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历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副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23。

●责任编辑:桂 莉

① Walter, Rü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I. p. 187.

② M. Kulczykowski. *L'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Cracow: Prace Historyczne, pp. 101~104.

③ 宗教改革时曾被关闭。

④ 北欧一种货币。

⑤ S. E. Stybe. *Copenhagen University: 500 Years of Science and Scholarship*. Copenhagen: Copenhagen UP, 1979, pp. 36~37.

⑥ “盾”系一种尼德兰货币,荷兰语为 Gulden,13 世纪始即在尼德兰流通。

⑦ P. B. M. Blaas, J. Van. Herwaarden. *Stedelijke Naijver: De Betekenis van Interstedelijke Conflicten in de Geschiedenis, Enige beschouwingen en Case-studies*. The Hague: Mouton, 1986, pp. 110~111.